

澳洲见闻

唐振常 著



中国旅游出版社

澳洲见闻

唐振常著

中国旅游出版社

责任编辑：蒋国泰

封面设计：马玉连

澳洲见闻

唐振常 著

*

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长安街六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4 字数：78千

1986年10月第1版 1986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3,500册

统一书号：10179·875 定价：0.95元

目 录

历史学家的散文 (柯灵序)	(1)
异国“中秋”	(5)
城市山林堪培拉	(9)
澳洲国立大学校园	(13)
名副其实的大学院	(17)
野趣	(21)
住房和生活	(25)
庭园之乐	(29)
一个工人家庭	(33)
残废人种种	(36)
万金难买一家书	(39)
赛船赛马之类	(42)
说客事件	(45)
作客难	(48)
说吃	(51)
动物世界	(54)
见钱“眼”开	(57)
市内交通	(59)
途中	(61)
历史文物保护	(65)
悉尼市内	(69)
卧龙岗上	(73)

墨尔本三日	(77)
悉尼三大学记略	(80)
在墨尔本两大学	(84)
关于图书资料	(88)
在国立图书馆	(91)
悉尼市立图书馆所见	(94)
研究与教学	(97)
关于学术讨论会	(101)
一席谈	(104)
塔州行之一	(107)
塔州行之二	(111)
塔州行之三	(115)
结束语	(118)
后记	(121)

历史学家的散文

——唐振常《澳洲见闻》序

柯 灵

我国实行启关去锁，对外开放以来，描述异国风光的文字日见其多了。这可以说是一种新时代的新事物，却并非破天荒第一遭。稍一回顾，清末维新运动前后，有识之士蒿目时艰，瀛海采风，遥天述异，就曾经时行过一阵。容闳、王韬、薛福成、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张元济等人，就都有过类似的著述。严复的借石取火，潜心译事，则几乎是尽人皆知了。百年来巨大的历史演变，世界与中国已绝不是旧时的面貌，但为了振兴中华，必须急起直追的情势，虽今昔异途，却并无二致。

时代毕竟不同了，从前有资格出洋游历的寥寥可数，现在却多于过江之鲫。其中以考察为名，行公费旅游之实的可置不论。行踪所至，触景生情，形诸笔墨的有心人，依然是各类知识分子，尤以作家为多。礼赞科学文明，描绘繁华景色，记述名都胜迹，间及奇风异俗，经纬其间的，则大都是友谊的交流阐扬。——这是和过去最大的不同点，标志着祖国命运的变化。因为只有国家与国家、人民与人民之间平等相处，才能产生真诚而不是外交辞令式的友谊。但一般的友好访问，难免浮光掠影，现在这类文字，渐由绚烂归于平淡，应当看作是一种进步。例如这《澳洲见闻》，因为作者是

历史学家，海外讲学之余，观察所得，涉笔成文，言之有物，而娓娓如话家常，就别具一种亲切有味的风格。

唐振常同志的生活经历，很多跌宕，也很发人深思。他是四川的世家子弟，降生时虽已后于“五四”三年，童年耳濡目染的，依然是传统的封建教育。他就读的中学是道地的古董传习所，上课、集会、就餐、临寝，都得朗诵经书“语录”，连厕所门前，也高悬木牌，大书“道在屎溺”，为三十多年后林彪发明的小红书开了先河。初入中央大学，还是屈从家长意志，专攻农艺。但旧世界的重重束缚，并没有把他禁锢住，他终于中途易辙，考入燕京大学，一转而读外文系，再转而读新闻系，并从反面落墨，副修历史，受教于名师陈寅恪，同时又投入席卷中国大地的民主浪潮。跻身社会以后，辗转于报馆编辑和文艺工作之间。他写成第一个电影剧本，就碰上“阶级斗争”的钉子，以骇人的罪名，遭到康生的迎头痛击。不久就是现在通称“十年浩劫”的那出“革命”荒诞剧开场。那时他似乎已经四大皆空，当造反派“宽大”为怀，准备给他一条出路的时候，他的志愿是当门房。但“四人帮”化为灰尘以后，不旋踵间，振常忽然改弦更张，以历史学家的新姿崛起，为蔡元培修传，评章太炎功过，代“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以“只手打孔家店”名噪一时而终于销声匿迹、谣诼纷纭的吴虞勾稽生平，拂清尘雾，又给清末《苏报案》中久已坐实为“奸细”的吴稚晖写翻案文章，代已无法自明的死人辩诬，以其材料的翔实，论据的坚强，态度的公正，见解的新锐而引起学术界的注目。

黎澍同志为振常的第一本历史论文集《章太炎吴虞论集》作序，戏测振常改行，可能与文艺写作易招祸殃有关，指出历史研究有同等的危险，古来不少历史学家就为此脑袋失

踪。“文化大革命”的引爆点就是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真可谓殷鉴在迩。其实文字牢狱的存废，思想网罗的疏密，关键在于政治是否清明，理性是否沉沦，否则只要涉足意识形态领域，而又不能自外于是非曲直之见，不甘当左右逢源的风派，就很难做到安全自保。如果在十年以前，单凭振常这些历史论文，“左”霸的几口唾沫，就可以使他灭顶而有余。想到这里，我们怎能不为三中全会以来出现的民主开明空气雀跃三百！文化工作者的安危固然重要，国家前途的荣枯明暗更值得关切。

写外国游记，似乎无关宏旨，却也并不保险，特别是引述新思潮，新观念。湖南人民出版社近年编印了一套《走向世界丛书》，第一种是郭嵩焘的《伦敦与巴黎日记》。这位清代光绪朝奉派出使英法的第一任钦差大臣，因为把首途使英的五十天日记，刻印成一本薄薄的《使西纪程》，而在其中赞扬了英国的议会制度，引起一场轩然大波，被认为“刻意夸饰”，怀有二心，弄得天下骚然，朝廷下诏申斥，传令毁版，最后郭嵩焘被迫“乞休归里”，在谤毁笑骂中郁忿而终。原来我们是“天朝上国”，无所不有，礼乐政教，更优于“夷狄之邦”。外来思想属于异端，难免玷污清白，必须严加防范。不知这种祖传的“优越感”，是否还在继续发挥作用？

振常写史论，谨严整饰，力求做到无一字无来历，但也偶作散文随笔，以苏腕力，《澳洲见闻》就是这一类产品。游目骋怀，舒徐自然，对大洋洲的风土人情，随宜点染，各尽其美；而逡巡之间，又多在于历史、文物、学术、图书，不失学人之致。文字凝练洒脱，显示早年所学国学基础的工力。集中也有不少篇什，描山画水，风景写生，却是挥洒自如，着墨不多，而神完意足，不同于那种金碧辉煌、色彩浓艳、

脂粉堆砌之作，或者可以因此幸免于“刘老老进大观园”之讥吧。

一九八五年九月一日

异国“中秋”

从香港飞悉尼，全程时间大约是十四个小时。昨夜十时十五分起飞，尽管飞机平稳舒适，没有什么吵闹的声音，毕竟不是安然地躺在床上，一夜之间，朦朦胧胧，未曾入眠。忽然感觉机舱外有亮光，眼皮再也合不拢来。向外望去，红日一轮喷薄而出，由暗而明，由弱而强，飞机行驶在云层之上，或俯瞰，或远望，都成壮观。去年此时，正在浙江莫干山，几次早起去观日台，都因天阴一无所见。扫兴之情，今天得到了补偿。又想到“文革”期间在海边干校，“劳动改造”之余，也曾往返几里路去看日出，那时候当然是天不逢时，人不走运，终无所得。倒是幼年在家乡的青城山的上清宫看日出，景象至今不能忘。现在从飞机上看日出，一是居更高而临下，二是镜头可以拉远，感觉已经不同；而飞机在行驶，视觉的活动变幻也大，如同由看幻灯片而变成看电影，动的感觉强烈，视境开阔多了。

这时，我看了看表，才四点钟不到。何以澳洲日出这样早？猛然之间醒悟过来，中国和澳洲时差两个小时，这里应该是早上近六点钟了。

中午十二点钟，机到悉尼。竟想不到，一切手续都很简便，很快就出了机场。这种意想不到之情的由来，倒并非全由于我们的办事手续多繁复而起，兼有在香港机场的遭遇而然。一向手无缚鸡之力，随身带的手提包几乎是空的，两件交运的行李过重，付了一千多元的港币。上了飞机，填写携

带限制数量的物品表格时，才知道香烟数量限制一条。懊悔没有入境先问俗，一面如实填写所带香烟超过限制之量，一面想，按香港经验，大约得另交一笔钱，如果带的钱不够，而又无人来接，那怎么办？

倒是有人来接。一位是新南威尔士大学的经济史高级讲师 Louis Sigel 席路易先生，他受我的朋友澳洲国立大学远东历史系教授骆惠敏的委托来接。一位是上海朋友的女婿，带着他的一位亲戚同来。这几位我都没有见过，他们带着我的照片，到此“验明正身”。在机场出口处，朋友女婿在叫唐伯伯，我们自然相认了。席路易先生也认出了我，很快迎了过来。他们要我出机场，我说，香烟携带过量，还得去办手续交钱。他们笑了，说没有什么手续要办了。这才释然。

朋友们带我去吃中饭。车行所经，只间有一些低矮的房屋。饭馆是一家广东人开的中国餐馆，座落在悉尼的唐人街上。朋友女婿的姑父母和表妹也来了，他们久居此间，而山东口音未改，习俗亦未改。这位刘先生，朋友女婿的姑父，知道我的目的地是堪培拉，邀我在他家住几天再走。我自然应该先去国立大学报到。他又说：“我们晚上订了一桌饭，原以为你和我们一起过中秋节的。”这才记起今天是中秋节了，那位上海朋友托我带给她女婿的礼物，本来就是上海杏花楼的月饼嘛。不但是年年中秋对我无以异于平常，就是中秋后两日犬齿又增一岁之日，对我也无以异于平时。我在哪里过中秋都是一样。

饭后，以车代步，在悉尼街上稍作浏览，自然不得要领。看见了一些建筑物，只记住悉尼大学所在。即使在那里吃过饭的唐人街，也只是在它的边沿上走过。当时对悉尼可以说还没有印象。但是，久已闻悉尼繁荣之名，以后在堪培

拉住定下来，朋友们又往往以悉尼的繁荣对比堪培拉的清寂，我想，要了解悉尼，有待于他日的再来。今天只是小作停留，未睹惊鸿。

席路易先生早已为我购好从悉尼到堪培拉的机票，行李已经由航空公司转运到这个班机上，用不着自己搬来搬去。起飞的时间是下午三点五十分，这几位新结识的朋友把我送回机场，我就坐在候机室里休息。这里是宽敞无比的大厅，一处处略形分割的小厅，写明是某次班机何时去何处。人来人往，状颇幽闲，既不匆忙，更不拥挤，有点象散步的样子。惠敏早告，班机很多，搭乘方便，自然就不拥挤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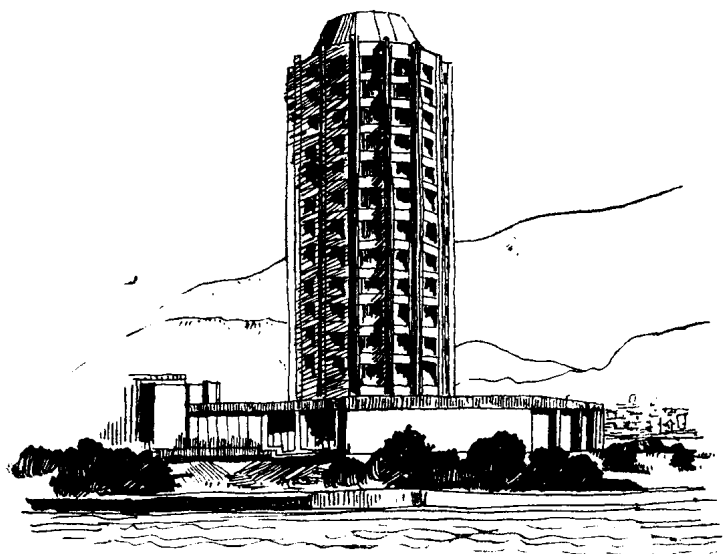
从香港来悉尼，乘 Qantas 国际航班的波音 747，机上乘客没有满座。经布里斯班，下去了一批，人更少了。从悉尼到堪培拉，换乘 Ansett 班机，飞机小得多，机上乘客更少，周围都是空位。俯瞰窗外，晴空一片，或山岳丘陵起伏，或海天相接，空蒙万里。澳洲正是春天季节，如刘先生所提醒，我却到此过中秋。

这个中秋之夜——在这里应该叫春初的晚上，我在堪培拉和多人相聚，参加了一次晚餐。到了堪培拉，惠敏夫妇带着他们的两个小孩来接。他们把我送到我的东道主所在的澳洲国立大学。我住的地方叫做 University House 大学院，是国立大学用来接待各国来的学者的地方。惠敏和他的夫人今晚另有宴会。他告诉我：大学院每星期三晚上举行院餐 House Dinner，凡长期住户均免费供应。在餐会上可以结识许多人，他认为这是我的权利，应该去参加。尽管已经很疲劳，又什么东西也吃不下，我也就去参加了。

院餐在一间大厅里举行。这间大厅有三层楼那样高，宽长可容二三百人，看起来有点象教堂。这种院餐仿照英国牛

津和剑桥的传统方式举行，无非是给人以社交的机会。大厅内今天放了九张长桌，共坐了一百多人。有趣的是，入座之后，电灯齐灭，只有高高的屋顶上几盏灯亮着，灯罩向上，光由屋顶反映而下，极为微弱，因而，每张长桌上的蜡烛亮光就大放异彩，显得颇有情调。蜡烛光下，人们吃饭饮酒，邻座相互交谈，不闻喧嚣的人声，没有祝酒讲话之类的举措，显出家常气味，从容和谐。

异国第一夜，在此是春夜，尽管我脑里想的是中秋佳节，却未及计月是圆与缺。



城市山林堪培拉

古人喜欢说城市山林，也许人各有一套自己的想法，不能认为城市山林有一个固定的模式。我想，它至少是城市而具有山林之胜，人绝不是很拥挤。没有这两条，当不能称为城市山林。我不知道我们古人心目中的城市山林究竟具体何在，但是，自从我有生之年，看见的都是人烟辐辏，商店栉比，就无所谓城市山林了。如果这个名称还见之于文章中，恐怕只能说是不甘寂寞的隐士心情的流露而已。没有想到，多年以来只是在书本上见到的城市山林，居然于此异国得之。

飞机到了堪培拉，朋友惠敏夫妇载我驱车行去。一路所经，都是沿公路而行，但见树木与草地，点缀其间的是房屋建筑。惠敏夫妇介绍这所房子是什么，那个建筑是什么，我自然记不清楚。按照一般的概念，总以为这还在郊区，我们将逐渐驶入市内。于是我问：城市在哪里？他们夫妇相与大笑，说这就是城市，这就是堪培拉。初听之下，我实在有些弄不明白，这怎么就是城市，而且是一个国家的首都？虽然我不至于在这里去寻找城墙，至少总得看见有许多排列成行的街道，鳞次栉比的房屋，熙来攘往的人群。可是，在这里，街道有而不多，房屋不是那么拥塞在一处，人不成群，更难说熙来攘往了。那么怎么能说是城市呢？

许多天来，我逐渐了解了堪培拉。它是一个城市，它又是一座花园，它是所谓城市山林。

堪培拉富自然之胜。它的北面有三座山——艾茵斯莱山，黑山和快乐山，有莫伦格鲁河，尤其是以昔年首都建设总监伯利·格里芬命名的长达二十多公里的人工湖声名最著，山环水绕，为这座城市增添了生命和色彩。尤其令人神往的，是这里的树木。据称堪培拉有树木八百万株，可贵的是，品种繁多，南半球和北半球的各种美丽的树木，应有尽有。有白桦，西洋杉，苏格兰松，榆树，胡桃，枫树等等，而以桉树为最多。那位驰名的建筑师伯利·格里芬把桉树称为诗人之树。这里正是春天季节，桃花与樱花盛开，白色成一片，紫藤花盘绕藤架，花瓣很长，花呈浅紫色，淡雅宜人。柳树亦复不少，而以湖边的最好，垂柳千条与湖水相映，颇似西湖堤上景象。我所居的国立大学大学院后面的大片草地上，有六株我叫不出名字的同品种同大小的树木，环成一个圆形，每株距离相等，盛开红花，不管从哪一面看去，都是一片红色，美丽极了，鲜艳极了。澳大利亚人喜欢树木花草，政府鼓励植树养花。约翰·根室的《澳新内幕》记载，过去，每一座新房子落成，政府发给四十丛灌木和十棵树，甚至还免费给每家庭院修剪树篱。现在不这样做了，但堪培拉已成为花树之城。

堪培拉经常遭受干旱。干旱过后，草就发黄，除了影响国家以为命脉的畜牧业，景色当然也大减。今年春天，雨水特别多，人们说是有些反常，而草地一片绿，大大增添了景色的美丽。提起草地，在这里简直多得不可胜计。堪培拉是畜牧区，中国江南农田水利之盛，这里完全没有。牧场自然是大片大片一望无际的草地，间有牛羊行走其间，予人以四野茫茫之感。任何建筑，任何单位，都有修剪得整齐的草地，以至于私人住宅，在花园之中必有一块或大或小的草地。草地

成了这里不可缺少的景色。

有人以为堪培拉如同乡村，不是现代化的都市，约翰·根实就是这个看法。在《澳新内幕》里，他发表了颇多的意见。他的话容或有所据，我并不以为然。堪培拉有街市，有多处城市中心，但不拥塞。如果在这里寻求繁华热闹，你会失望。但是，那整齐排列的道路，你可以安然漫步；商店货物丰盛，它的陈列，它的色彩，都使你总想买点什么。街心总有草地，总有喷泉，也有树木，它们和街道、商店是和谐的。如果和现代一些都市相比，这里的高层建筑一是不多，二是不高。政府限制层数与幢数。建造任何房屋都要经过政府批准。地广人稀，我想没有必要去追求高耸入云的建筑。现在的建筑，不管是政府部门，还是公司银行，最多十层，点缀在如画的风光中，没有产生煞风景之感。如果说生活上的方便，这里不管住在什么地方，总是方便的。整个城市，让人感到自然、美丽和安静。我散步国立大学校园，常常只闻鸟语，不听人声。在住处或办公室读书做事，也感到安静无比，除了窗外的汽车之声，不感到任何吵闹。在街上行走，也总是人很少，可说全无市声。星期五晚上和星期六、星期天也是如此（澳洲实行五天工作制）。一个星期六晚上，和惠敏去接他的妻子海伦从悉尼回来，我们走来走去，见到的行人少极了。这里没有都市的夜生活，有一些酒吧间，顾客并不多。据说，从前是禁止用霓虹灯的，现在夜晚有霓虹灯点缀，但只是一种淡淡的点缀，没有增加视觉的喧嚣。青年人可能不满意这样的生活，他们会感到寂寞。星期六晚上，我们漫步街市的时候，遇见前两天曾去拜访而未遇的研究史前史的葛生教授，他对我说，你看见这里的景象，一定会大吃一惊。我说，我喜欢这里的安静。他说，但是，这是一座死

城。我以为这是过甚之词。在这里，人们有他们的生活之道。平常各干各的事，周末许多人去野餐或划船。

谈堪培拉的美丽，不能不想到众多的住宅区。这里的人，差不多都有一幢住宅，每一个住宅都是一个独立的小院，以平房为最多，加上地下层。这里人讲究住平房，不喜欢住高楼。住宅房屋各式各样，仿佛是一个建筑大竞赛，每一幢住宅必然少不了一个花园，树木葱茏，修整宜人。我去了好些人家，毫无例外。每一个住宅区都有一个小的街市，几个住宅区构成一个大的区，那里街市较大，还另有学校，医院，图书馆。住宅的美丽，住宅的风光，是堪培拉这座美丽的大花园的组成部分。

澳大利亚是个年青的国家，把首都从墨尔本迁来为时更晚。当时，这里几乎是空无所有的溪谷，按照这里的自然条件，八十年之间，建成这样一座美丽的山林城市，自然，和谐，开阔，人们付出了应予称赞的劳动。我对堪培拉朋友称赞这座城市的美丽，我也对他们说，你们的人口只有二十多万，是一个优越的条件。如果是堪培拉人口几百万，恐怕也就困难了。他们以为然。

